

# 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学习型城市建设市民行动机制研究

顾凤佳<sup>1</sup> 朱益明<sup>2</sup> 陈劲良<sup>1</sup>

(1. 上海开放大学, 上海 200433; 2.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摘要】**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推进有赖于市民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的转变, 这一转变已成为当前学习型城市建设亟待回应的现实议题。本研究以S市为研究场域, 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三类情境的18位参与者开展深度访谈。结果显示, 普通市民参与学习活动, 以体验与情感获得为主, 主理人体现出从“参与者”向“建设者”的跃迁, 政府与社会组织承担制度供给和治理协调功能。研究发现, 市民参与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 只有市民的参与意愿被激发后, 才会转化为行动实践; 协同机制建立和多样化互动平台的形成, 使市民在持续交流与合作中不断深化参与程度; 增强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感, 也是市民长期和稳定参与的动力。为此, 本研究建议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完善参与机制、优化角色转化路径与强化情感认同等策略, 以推动市民深度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

**【关键词】** 学习型城市; 市民参与; 主动治理;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G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26)01-0112-09

## 一、问题提出

城市的核心是人, 学习型城市建设亦需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球城市化与终身学习理念日益普及的双重背景下, 学习型城市建设作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公民素养与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理念, 日益成为各国教育与社会政策的核心议题。然而, 学习型城市建设往往面临“动员有余而参与内驱不足”的困境, 市民参与普遍呈现被动响应、形式化参与与持续性弱等问题, 难以实现“共

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愿景(顾凤佳, 2020; 赵文君, 2017; 蒋亦璐, 2017; Longworth, 1999; 孙刚成等, 2025)。

在我国, 学习型城市建设已由起步探索逐步迈向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阶段。政策普遍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市民广泛参与与能力赋能, 各地也不断探索以社区教育、终身学习项目和学习型空间为抓手的推进路径。然而, 具体实践仍存在显著张力: 一方面, 制度设计持续强化公众参与的规范性表达; 另一方面, 市民往往仍被当作“学习对象”或“服

**【收稿日期】** 2025-11-22

**【修回日期】** 2025-12-15

**【DOI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26.01.012

**【基金项目】** 2024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上海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创新策略研究: 基于多元主体协同的视角”(C2024054)。

**【作者简介】** 顾凤佳, 博士, 副研究员, 上海开放大学发展研究部, 研究方向: 学习型城市、终身教育(gufj@sou.edu.cn); 朱益明,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研究方向: 教育政策、教育战略与规划(ymzhu@dedu.ecnu.edu.cn); 陈劲良, 助理研究员, 上海开放大学发展研究部、科研处, 研究方向: 社区教育(chenjl@sou.edu.cn)。

**【引用信息】** 顾凤佳, 朱益明, 陈劲良(2026). 从参与者到建设者: 学习型城市建设市民行动机制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 32(1): 112-120.

务接受者”,其参与意愿、行动能力未能得到充分彰显。

围绕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市民参与问题,学界已展开丰富的探讨。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992)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通过强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构建支持终身学习的城市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UNESCO, 2013; UIL, 2015; UIL, 2022)倡议将“包容性”作为学习型城市的核心价值,并强调建设学习型城市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职责,还应动员社会各界协同推进。相关研究认为,各方保持紧密互动才能建立强大、有效的终身教育体系(诺曼·朗沃斯, 2016; 保罗朗格朗, 1996; Pavlova, 2018)。国内学者结合城市治理语境,强调跨部门协作与伙伴关系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袁雯, 2013; 刘雅婷等, 2019)。

在实践层面,多元主体参与逐步被纳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制度设计框架。上海、北京等逐渐形成以政府统筹、教育部门牵头、各部门协同、社会广泛参与的推进机制,力图通过制度整合与资源协同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相关研究也建议打破原有碎片化格局,坚持机构间互联互通、打造协同融合的社会结构路径,推动治理机制现代化(程豪等, 2021)。学者还建议建立开放型、全程参与的多元协同平台,通过规则制定、角色明晰、利益平衡和协商决策等方式,形成良性的制衡机制(林辰芳等, 2019)。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将关注重点从“是否参与”转向“如何参与”。阿恩斯坦(Arnstein, 1969)提出的“市民参与阶梯”模型,为理解市民从象征性参与迈向实质性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日本社区强调以居民为主体,通过行政、非营利组织、企业共同协调合作,从“硬”和“软”两方面解决地区、社区特定课题(胡澎, 2013)。费尔德(Field, 2005)从社会资本视角指出,市民的学习与参与深受社会网络、信任关系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社会资本”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区、共同价值观和信任等无形资源(张慧睿等, 2022)。相关研究揭示,非正式学习与实践参与在提升公民能力与责任意识方面具有独特价值(Schugurensky, 2000)。国内研究者也逐渐关注情感归属、地方认

同在社区学习与治理中的作用,同时提醒需警惕情感治理可能带来的制度弱化风险(许莉莎, 2024; 郑玉萍等, 2023)。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从制度设计、治理模式和参与理念等层面对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市民参与问题展开了有益探索,但对市民如何在实践情境中实现从“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建设者”的角色转变,仍缺乏基于行动过程的系统分析。“主动建设者”不仅意味着参与程度的提升,更意味着市民需同时承担学习者、协作者与治理行动者等多重角色,成为学习型城市治理体系的主体。

本研究选取 S 市学习型城市建设有代表性的社区学习项目案例,采用扎根理论分析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行动过程,旨在丰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为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 二、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强调从经验材料出发,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编码等,逐步建构理论框架(朱丽叶·M. 科宾等, 2015)。多数学习型城市研究以政策分析、案例归纳为主,但也有研究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市民学习参与的动因与路径(何雪松等, 2019; 马思静, 2023),展示了这一方法用于行动机制分析的优势。基于此,本研究借助扎根理论,探析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践逻辑。

###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S 市 18 名参与社区学习项目的市民、主理人、街道干部、社会组织代表和志愿者为研究对象(见表 1),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多维度呈现市民从被动参与者到主动建设者的转变机制。研究涵盖三类典型参与情境。

1)市民自治型——以 A 区“睦邻主理人”项目为代表,该社区鼓励具备组织能力和参与意愿的居民自发组织、设计和推动社区学习活动,实现从“参与者”到“主理人”的角色转化。本研究选取该项目中参与度高、持续性强的居民主理人,观察其行动动因、演进路径与自我认同建构过程。2)社区推动型——以 B 园区“社校企共建”项目为代表,街道、社区作为主导力量,联合学校和企业等主体推动市民参与的机制创新。3)社会组织推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类别	访谈对象类型	人数(人)	特征与背景	研究价值与关注重点
市民参与者	普通市民	6	有参与经历及感知变化	揭示参与动因、参与体验、变化感知及“被动—主动”萌芽阶段
主动建设者	“主理人”、志愿者骨干	4	从参与者到组织者的转变	探析从参与到组织的动力机制、社会支持与行动策略
实施推动者	社区工作人员、街道干部等	5	了解制度安排和支持机制	理解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及支持市民参与的制度逻辑
合作主体	社会组织代表等	3	理解资源整合与治理协同	分析跨界协同方式、平台建设经验及治理合力的生成机制

动型——以 C 舞蹈老年大学为代表,由当地某知名社会组织发起并运营,面向老年人提供系统的舞蹈课程。本研究选取该社会组织核心成员、学员及志愿者骨干等作为访谈对象。上述样本可从不同治理路径反映市民行动的差异与共性。

(二)数据采集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围绕以下主题展开:1)参与契机与动因;2)参与后的情感体验、角色变化与能力提升;3)社区、社会组织与政策制度的支持与影响;4)个人对社区归属感与公共事务责任感的演变;5)参与的持续性与未来意愿。研究人员 2025 年 1-7 月间,开展 3 轮访谈,每次时长 40-60 分钟,经受访者同意后录音并转录成文字,共获 18 份访谈文本。研究人员校对所有访谈文本,以确保口语表述与研究语义一致。本研究还收集项目文本、宣传材料、新闻报道等资料,结合现场观察和政策文本资料等,深化对研究情境的理解。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据扎根理论方法,采用 MAXQDA 24 软件开展质性分析。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人员先对 15 份文本逐句逐段编码,建立行为、感知或制度三个语义单元,并赋予临时性概念标签。为确保编码信度,研究者采用独立编码与交叉校验机制,修正概念命名与范畴边界。待形成初步范畴体系后,研究者对剩余 3 份访谈材料补充编码,未发现新的概念或属性;最终形成 68 个概念标签,10 个初始范畴(见表 2),涵盖参与路径、动机转变、制度支持和治理协同等维度。

在主轴编码阶段,研究人员系统比对不同访谈对象及情境的概念共现关系,将初始编码聚合为更高层级的范畴,构建市民参与动因、制度支持、协同机制、学习赋能、情感归属等主范畴。到选择性编码阶段,研究人员以统摄性核心范畴整合前两阶段形成的主范畴,通过分析范畴间的关系和理论抽

象,形成市民从“被动参与”迈向“主动建设”的行动机制,揭示市民参与意愿激发、能力提升、角色转化与持续行动之间的变化关系。

三、数据分析与处理

下文从角色差异、参与特征与角色跃迁三个层面阐释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内在机制。

(一)角色差异

编码结果揭示了不同群体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关注点、参与方式与行动逻辑的差异(见表 3),这些差异源自社会角色与情境位置的不同,也体现了学习型城市治理结构的职责分化与角色互动关系。

普通市民访谈多集中于个人的学习收益与参与动因,其参与多源于邻里动员、兴趣驱动、问题导向等。学习收益突出表现为技能提升、生活便利和拓展社交关系等,并通过社交网络形成带动效应。例如,有受访者提到“学会使用智能设备后可以帮助他人办理事务”。

主理人群体访谈高度集中于“角色转换与行动转变”“内在激励与参与持续性”范畴,体现出明显的“行动主体化”特征。与普通市民相比,主理人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身份跃迁。他们对活动目标、社区需求与组织过程的理解更深刻,强烈认同“成就感”“责任感”等内在激励因素。比如,有主理人提到“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这件事值得继续花时间”“想着这件事情对社区有没有用,大家能不能受益,这种感觉会逼着你一直做下去”。这表明,主理人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他们既是学习共同体的组织者,也是居民行动力的践行者。

街道干部与社会组织代表访谈多集中于“制度嵌入与资源保障”“社区协同治理结构”等范畴,反映其关注参与的组织基础、资源供给、机制创新等。一位街道干部指出,“居民愿不愿意参与,和有没有制度托底关系很大。如果只是临时活动,大

表 2 开放式编码(部分)

原始材料片段	初始概念代码	概念说明	所属初始范畴	参考点数
“一开始是邻居喊我来听讲座,后来自己也找到不少课程。”	他人动员参与	参与起点由邻里关系推动	参与动因与路径	5
“参加社区活动后,感觉我能发挥点作用,就申请当主理人。”	主动承担组织角色	从参与者转变为建设者	角色转换与行动转变	7
“每次课程结束,我们都会交流意见,社工也会调整内容。”	活动反馈机制	形成稳定的反馈—响应机制	社区治理互动机制	4
“现在不仅自己来,还经常拉着亲戚朋友一起参加。”	社交性扩展参与	通过社交网络扩大学习参与群体	社会扩散效应	6
“老年大学课程有街道支持,申请场地也很方便。”	制度保障	制度为学习项目提供支持	制度嵌入与资源保障	5
“每次组织活动,看到大家积极参与,我很有成就感。”	参与成就感	参与者通过活动获得情感满足	内在激励与参与持续性	8
“虽然我文化不高,但这里没人嘲笑我,反而愿意帮我。”	包容性参与氛围	学习空间强调平等与尊重	包容性治理环境	3
“活动主题有时是集体讨论出来的。”	共议共建机制	共建机制增强社区协同治理能力	社区协同治理结构	4
“社区原来只是通知我干嘛,现在会提前征求我们意见。”	治理沟通机制转变	从单向管理到双向协商	治理模式演化	6
“学了智能手机操作,我现在能帮别人挂号、打车。”	学以致用	学习内容带来生活能力提升	学习成果转化与共享	3

表 3 各类主体关注重点与经验差异

初始范畴	普通市民	主理人	街道干部	社会组织代表
参与动因与路径	√			
角色转换与行动转变		√		
社区治理互动机制	√	√	√	√
社会扩散效应	√			
制度嵌入与资源保障			√	√
内在激励与参与持续性	√	√		
包容性治理环境	√			
社区协同治理结构		√	√	√
治理模式演化			√	√
学习成果转化与共享	√			

家热闹一下就散了,只有资源跟得上,事情才能长期做。”这表明,制度主体扮演着组织者、支持者和推动者等角色,不仅决定活动的可持续性,也决定参与的覆盖面、开放程度与制度化水平,是市民参与能否实现的重要前提。

(二)参与特征

在主轴编码阶段,研究人员对 10 个初始范畴进行比较与重构,提炼形成 4 个主范畴(见表 4),以揭示市民参与行为的动因、路径、制度与情感环境等特征。

其一,市民参与以多元动因为起点并在社会关系中不断扩散。该主范畴整合了“参与动因与路

径”“社会扩散效应”和“内在激励与参与持续性”三个范畴,反映了市民从外部诱因(如邻里动员、平台推送)到内在动机(如认同、成就感)的激发过程,内外因素共同构成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活动的原因。

其二,市民经历了从学习者到组织者的身份与行动跃迁。该主范畴涵盖“角色转换与行动转变”与“学习成果转化与共享”,指向市民实现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组织者的角色演化。行动跃迁不仅表现为参与角色的变化,也体现为认知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并通过知识再创造与经验分享,实现从单独行动到带领集体的跃迁。

其三,制度支持与协作网络是市民持续参与的重要基础。这一范畴包含“制度嵌入与资源保障”“社区协同治理结构”“治理模式演化”三类初始范畴,凸显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组织机制等制度因素对市民参与行为的支持。尤其是治理逻辑呈现由行政推动转向协同治理,表明制度的深度嵌入成为影响市民持续参与的关键变量。

其四,包容开放的学习场域促进市民的互动、归属与共同体意识形成。该主范畴融合“社区治理互动机制”与“包容治理环境”等初始范畴,强调平等尊重、情感支持、同伴激励等对市民参与的影响。研究显示,包容、协商的学习环境更有利于群体间的协作交流,促进市民产生归属感。

表 4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初始范畴	核心内容
多元动因驱动参与	参与动因与路径	市民受邻里动员、信息推送、兴趣引导等驱动参与学习,并通过社交网络扩散,形成持续激励机制
	社会扩散效应	
	内在激励与参与持续性	
身份转变与行动跃迁的路径与机制	角色转换与行动转变	从学习者变为组织者的路径清晰,学习成果外溢性强,推动参与者变为建设者
	学习成果转化与共享	
制度支持与协作网络的嵌入与运行	制度嵌入与资源保障	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制度安排和资源支持,构建协同治理的组织基础和可持续机制
	社区协同治理	
	治理模式演化	
包容氛围与互动机制	社区治理互动机制	构建情感支持与平等交流氛围,激发市民主体性,提升社区凝聚力与认同感
	包容性治理环境	

(三)角色跃迁

选择编码阶段,本研究提炼出一个统摄所有主范畴的核心范畴:“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的角色变迁历程”(见图 1)。该范畴涵盖动因触发、身份转化到制度与环境支持等,揭示市民由“参与者”向“建设者”演进的关键驱动力与影响路径:多元动因驱动作为行动跃迁的初始条件,解释市民参与的外部刺激与内部认知基础;身份转变与行动跃迁的路径机制体现市民行为方式和治理能力的演化;制度支持与协作网络嵌入为角色跃迁提供支撑,体现市民参与的制度化、组织化基础;包容氛围与互动机制作为情感与关系维度的调节机制,体现参与者

的归属感和持续性。

从范畴统摄性看,该核心范畴能够在概念层面整合并解释前一阶段形成的各主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能以“角色变迁”为主线,将分散的行动条件、过程机制与情境因素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而且,该核心范畴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与过程性,能完整呈现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演进轨迹。

四、结论、讨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揭示市民参与并非线性累积,而是受多重动因触发、路径转化、制度与环境支撑影响的动态过程。

1. 多元动因激发市民参与意愿

第一,多元动因激发市民参与。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并非单一政策动员的结果,而是在政策倡导、社会关系网络、个体兴趣与生活需求等因素交织下生成的。政策引导为市民参与提供入口,邻里邀约、熟人推荐等社会关系降低了参与的不确定性与心理门槛,学习、社交与生活改善等现实需求,为学习参与提供稳定而持久的内驱力。

第二,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睦邻主理人”项目中,不少居民因亲友推荐、邻里邀约而参与活动。有访谈者指出,“因为认识她(邻居),她叫我来试试看。”邻里邀约有高信任、高接纳特点,是促进学习参与的有效路径。

第三,个体兴趣和生活需求构成学习参与的内生动力。特别是老年群体、有育儿需求的家庭,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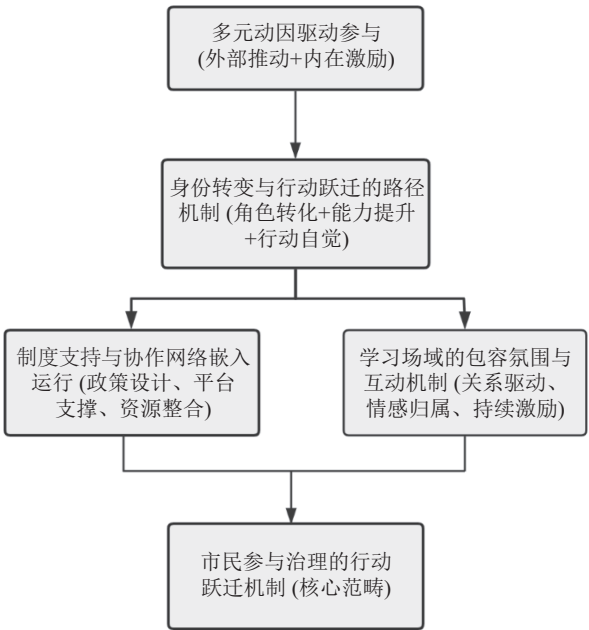


图 1 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角色变迁历程

取学习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或扩展社交圈成重要动因。例如,老年大学学员表示,“在这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认识人,生活更有劲”。这反映出其参与行为背后隐含着强烈的生活意义建构和情感归属需求(高茜等, 2023; 孙立新等, 2021; 叶长胜等, 2023)。

社区、社会组织与文化场馆提供的非正式学习空间也激发市民的参与学习兴趣。这些组织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和温和的引导,激发市民产生持续的参与意愿。

## 2. 能动身份推动参与深度

研究表明,市民参与学习并非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其身份会随着学习进程逐步由“参与者”转为“建设者”,并呈现明显的能动性。这一身份跃迁并非偶然,而是在持续参与、能力生成与制度赋权共同作用下自然形成的。

持续参与提升了市民对公共事务的认知与信心。部分居民从“能不能做好”到“我可以组织别人”,实现角色的质变,体现出主体意识的萌发。这一转化离不开制度与组织的赋权与支持。研究显示,多位“主理人”反映,街道或社区提供专门培训、经费支持和顾问协助等。这种制度安排既回应了居民初期参与的“能力焦虑”,又通过提供试错空间,增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

情感认同与社会反馈发挥着关键作用。市民在学习参与中逐步形成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同伴与组织的正向评价又强化其自我效能感,使其参与动机由外部驱动转向内在认同。此外,模仿机制亦有推动作用(Daniele, 2012)。多位受访者提到“看到某某做得好,我也想试试”。这表明,榜样能带动市民从被动参与者转向主动建设者。

## 3. 协同治理提供结构性支持

市民从被动走向主动,并非仅依赖个体意愿与能力提升,还有赖于制度保障与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支撑。学习型城市建设本质上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实践,其运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同治理结构是否稳定、开放且具备弹性。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社区、街道、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主体逐步形成以社区为枢纽的网络化协作结构,各方依据自身职能与资源优势分工协作。这种协同机制突破传统单一主体主导的治理模式,

为市民参与提供组织依托与行动空间。制度协同机制增强市民参与的可持续性。通过议事协商平台、联席会议制度和专项经费支持等,多方主体可以在规则框架内开展合作,消除可能出现的责任模糊、资源错位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协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市民信任与公共责任感。当治理参与不仅仅停留在“参与活动”,而是进入“共商机制”与“共创成果”,市民行动更易变得可持续。这种基于制度设计与合作实践的协同,不仅能提升学习型城市建设整体效能,也能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

从全球视野看,这种多元协作机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倡导的“包容性”“协同治理”等理念高度契合。我国近年兴起的“楼宇党建”(周俊等, 2020)“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向春玲, 2018)“社区学习团队”(叶忠海, 2018),均体现了协同治理的重要价值。

## 4. 情感归属激发市民持续参与动力

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离不开对公共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情感性投入。研究发现,参与者能否长期投入学习型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情感获得和归属体验。

访谈资料显示,参与者频繁提及“被需要”“关系更近了”“觉得自己有价值”等,表明市民参与获得社会认同与意义感。这种情感获得并非附带结果,而是持续参与的驱动力,其作用机理与自我决定理论所强调的“归属感—内在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高度契合(Ryan et al., 2000)。

集体荣誉感与社区文化也发挥着持续激励作用。例如,在“睦邻主理人”项目中,市民不仅参与组织和管理社区活动,更成为社区文化的塑造者和传播者。部分参与者表示,“我们小组像个家”“我参与的事情开始影响到周围人”,这种从个体行为到集体归属的转换,表明市民形成心理归属与身份联结。社区仪式、激励制度与传播平台强化了这种情感驱动机制。例如,设立年度“十佳”睦邻项目评选、睦邻“种子”项目等,通过微信公众号讲述“人物故事”,均有助于增强市民的社会存在感与持续投入意愿。

## (二) 建议

本研究发现,制度支持与个体诉求是激发市民



参与的动因,进而引发其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建设的行为跃迁;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与市民之间的协同增强市民学习参与与治理意愿;市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积极社会反馈是推动其持续参与的重要动力(见图2)。上述路径交织联动,共同构成市民学习参与的生成机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 1. 构建多元动因驱动机制激发市民内生动力

市民是否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在于其内在动因的激发,仅依赖政府主导的行政动员难以形成持续的参与热情。

一是构建差异化激励机制。例如,针对老年群体突出健康与社交需求,针对青壮年群体可结合职业发展与家庭教育等议题,激发参与动机。二是推动学习内容与社区生活场景深度融合,使市民在“生活即学习”中生成参与意愿。三是鼓励市民自我表达与参与公共事务,增强其行动的公共性与成就感,形成“我想参与”“我愿参与”的内生动力。多元动因机制不仅关乎参与率的提升,更关乎城市治理文化的重塑。

### 2. 搭建协同治理平台

市民参与不仅依赖内在动因的激发,也离不开稳定、有力的组织载体与制度支撑(林世员,2023)。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单一主体推动的分散性参与已难以适应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需要构建跨主体协同、资源共享、任务共担的治理平台,为市民参与提供制度化、常态化路径。

一是强化社区基层治理平台的统筹能力。社区居委、街道办等基层组织可通过引入“主理人制度”“学习议事会”“学习共同体”等,为市民提供参与入口与交流机制,增强参与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二是推动社会组织、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与社区共建共享学习资源与活动载体,形成服务与治理双向嵌入的协同机制。三是利用数字技术建设一体化平台,打通学习、反馈、激励、传播等功能模块,提高参与的便利度和响应效率。构建协同平台不仅是资源整合的过程,更是制度嵌入和关系重构的过程,有助于打通不同主体边界,明确市民参与路径,推动城市学习生态更加开放。

### 3. 优化角色转换路径

市民从参与者向建设者的转变,是学习型城市走向深层治理变革的关键。研究表明,市民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能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学习、协作与反思逐步提升的。构建系统化、可持续的角色跃迁路径,是推动市民由“被动”走向“主动”的重要保障。

一是推进从“参与机会”向“赋能成长”转变。这包括:在初级阶段,通过微项目、志愿活动等,激发市民兴趣;在进阶阶段,结合需求提供领导力培养、治理工具等培训,提升其能力。二是搭建“从学习者到引领者”的支持通道,包括: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市民参与议题策划、项目执行与资源协调,推动其成长为社区“主理人”“组织者”,增强其公共治理的责任意识与组织能力;构建正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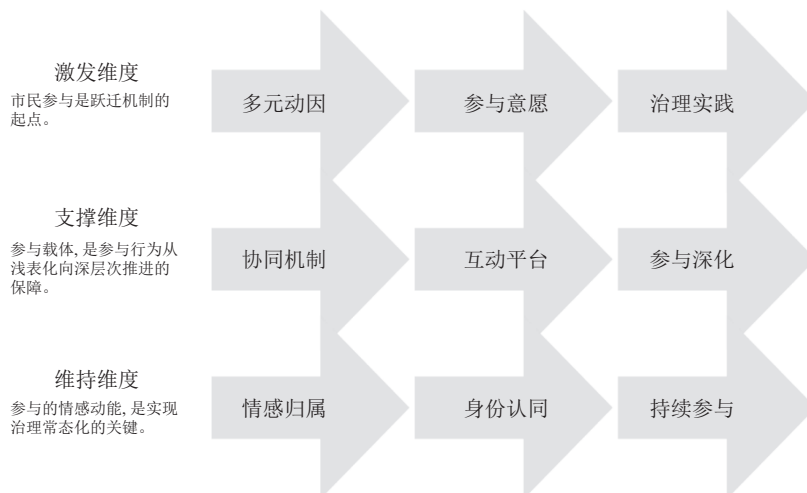


图2 “市民参与建设的行动跃迁机制”逻辑路径

激励反馈机制,强化市民角色转变的身份认同与成就感,如通过官方认可、公开表彰、发展路径支持等形式,让市民感受自我成长的价值,进而激发其持续参与。这种角色转换不仅会激发市民潜能,还能培育基层治理人才,为学习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 4. 强化情感归属

情感归属是市民持续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心理支撑。市民获得归属感、认同感和价值感,才可能真正转变为“建设者”。

一是通过组织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学习项目、节庆活动、共同议题讨论等,增强市民对社区的情感黏性与身份认同。二是通过社区居民讲述自身学习与参与故事,培育邻里互助、共荣共生的社区文化。三是通过设计多年龄段、多背景居民共同参与的学习项目,打破群体壁垒,增进相互理解与尊重,进而构建互信互助的学习型社区。当市民的情感归属转化为稳定的社会连接力,将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长效的社会心理支持和文化土壤。

#### 5. 建立参与评估与反馈机制

科学的参与评估与反馈机制是重要保障,本研究建议构建涵盖过程激励、行为表现、社会影响的评价体系,探索积分制、荣誉榜等反馈机制,推动市民与城市共生共治。

一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市民参与项目建立全过程评价体系,设定清晰的参与目标、行为指标和学习成果,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追踪、行为记录等方式,收集多元数据,动态跟踪参与质量与成效。二是设置常态化的意见征集、议题协商与共识机制,增强市民的参与感,提升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三是通过简明易懂的数据呈现、故事化传播与开放的反馈渠道,将评估结果反馈给社区和市民。这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市民参与的质量和积极性,还能增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透明度、互动性与可持续性。

#### [参考文献]

- [1] Arnstein, S. R.(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5(4): 216-224.
- [2] 保罗·朗格朗(1996). 终身教育导论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52.
- [3] 程豪,李家成,匡颖,张伶俐(2021). 反思与突破: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J]. *开放教育研究*, 27(2): 42-50.

- [4] Daniele, V., Ramasco, J. J., Sánchez, A., & San Miguel, M.(2012). Social and strategic imitation: The way to consensus[J]. *Scientific Reports*, 2(686): 1-6.
- [5] Field, J.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lifelong learning [M].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141.
- [6] 顾凤佳(2020). 上海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58.
- [7] 高茜,刘美凤(2023). 学习赋能老年角色建构: 场景与实践路径 [J]. *中国远程教育*, 43(12): 76-85.
- [8] 胡澎(2013). 日本“社区营造”论——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 [J]. *日本学刊*, (3): 119-134+159-160.
- [9] 何雪松,侯秋宇(2019). 城市社区的居民参与: 一个本土的阶梯模型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5): 33-42+236.
- [10] 蒋亦璐(2017).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全球历史回溯与本土现实思考 [J]. *开放学习研究*, (2): 33-40.
- [11] Longworth, N. (1999). Creating lifelong learning cities, towns and regions: A European policy paper [R].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4.
- [12] 林辰芳,杜雁,岳隼,王嘉(2019).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城市更新机制研究——以深圳为例 [J]. *城市规划学刊*, (6): 56-62.
- [13] 林世员(2023). 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 [EB/OL]. (2023-09-28)[2025-08-04].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3/2023\\_zl18/202309/t20230928\\_1083165.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3/2023_zl18/202309/t20230928_1083165.html).
- [14] 刘雅婷,叶笑寒,黄健,高小军(2019). 学习型城市建设: 全部门与跨部门的协同治理——UIL 终身学习国际咨询论坛概述 [J]. *教育发展研究*, 39(1): 77-84.
- [15] 马思静,张家荣,张玉钧,张茵(2023).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38(4): 1089-1103.
- [16] 诺曼·朗沃斯(2016). 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地区、学习型社区: 终身学习与地方政府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6.
- [17] OECD(1992). City strateg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 CERI/OECD study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Congress on Educating Cities[R]. Gothenburg: City Education Committee: 26-32.
- [18] Pavlova, M.(2018). Fostering inclusiv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green” skills development in learning cities through partnership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64(2): 1-16.
- [19] Ryan, R. M., & Deci, E. L.(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68.
- [20] Schugurensky, D. (2000). The forms of informal learning: Toward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field[R]. NALL Working Paper No. 19. <https://utoronto.scholaris.ca/bitstreams/2d91687e-a45f-4e36-9666-cd78356ee49c/download>.
- [21] 孙刚成,徐书婕(2025). 学习型城市建设背景下的社区教育管理问题与改进 [J]. *广州开放大学学报*, 25(3): 65-73.
- [22] 孙立新,张家睿(2021). 角色理论视角下学习参与提升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研究 [J]. *现代远距离教育*, (5): 81-90.
- [23]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24). 《关于进一步深化学习型城



市建设的意见》解读 [EB/OL]. (2024-01-17)[2025-07-30]. <https://www.shanghai.gov.cn/wzjd/20240117/>.

[24] UIL(2022). Yeonsu declaration for learning cities: Building healthy and resilient cities through lifelong learning[EB/OL]. (2022-02-15) [2023-01-12]. [https://www.uil.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s/fichiers/2022/02/iclc5\\_yeonsudeclaration.pdf](https://www.uil.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s/fichiers/2022/02/iclc5_yeonsudeclaration.pdf).

[25] UNESCO(2013). Key features of learning city[R]. Paris: UNESCO: 4.

[26] UIL(2015). 墨西哥城声明: 建设可持续的学习型城市 [EB/OL]. (2015-12-01) [2024-03-15].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4932\\_chi](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4932_chi).

[27] 向春玲(2018). “红色网格”: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J]. 科学社会主义, (5): 107-113.

[28] 许莉莎(2024). 城市社区情感治理的现实问题和优化建议 [J]. 心理学进展, 14(1): 187-192.

[29] 叶长胜, 乐传永(2023). 老年学员学习体验影响机制研究——基于 N 市 768 份样本的实证分析 [J]. 开放教育研究, 29(2): 112-120.

[30] 叶忠海(2018). 社区学习团队是学习型社会的基石 [J]. 职教论坛, (1): 96-99.

[31] 袁雯(2013). 为了每个市民的终身发展——上海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探索 [J]. 开放教育研究, 19(4): 32-39.

[32] 赵文君(2017). 学习者参与视角下的学习型城市建设: 现状、困境及展望 [J]. 中国成人教育, (1): 6.

[33] 郑玉萍, 买欣, 王敏(2023). 认知、认同与溢出: 广州老年学习型空间的情感地理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32(6): 167-180.

[34] 朱丽叶·M. 科宾, 安塞尔姆·L. 施特劳斯著, 朱光明译(2015).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第 3 版)[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135.

[35] 周俊, 徐久娟(2020). 从嵌入到整合: 商务楼宇党建新发展——基于上海市 H 镇的实证分析 [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1): 58-64.

[36] 张慧睿, 于晶(2022). 社会资本与终身学习的关系解读——评《社会资本与终身学习》[J]. 终身教育研究, 33(5): 37-43.

(编辑: 赵晓丽)

## From Participants to Co-builders: A Study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in Learning Cities

GU Fengjia<sup>1</sup>, ZHU Yiming<sup>2</sup> & CHEN Jinliang<sup>1</sup>

(1.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in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ities.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superficial involvement, weak motivation, and limited governance engagement remain widespread in practice. To gain deeper insight into how citizens transition from passive participants to proactive co-governo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Shanghai as the research site and employs a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The study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8 participants across three typical engagement scenarios. Through systematic coding and analysis, the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Citizen Action Transition Mechanism for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key pathways underlying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1) Multi-motivational drivers→Willingness activation→Governance practices; 2)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Interactive platforms→Deepened engagement; 3) Emotional attachment→Identity recognition→Sustained participation. This mechanism reflects a processual transition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of extern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s, and intrinsic emotional drivers. The study concludes by proposing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deep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foste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ities, including stimulating intrinsic motivation, refining participatory mechanisms, optimizing pathways for role transformation, and strengthening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Learning citi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Proactive governance; Grounded theory